

“任人唯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它在中国绵延千年的大一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作为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保留至今。“任人唯贤”出自《尚书》：“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其中“贤”的意思是“有德谓之贤”。“任人唯贤”的意思是，重视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作用，并将“以德为本”“德本才末”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准。中国自古以来便坚持贤能治国的传统，确立了从善不从众的政治主张，提倡由贤德之人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力求通过贤能治国，克服群体的短视和非理性，从而实现真正的良政善治。

《孔子家语》中记载，哀公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在孔子看来，尽管文王、武王的施政纲领记录在典籍之中，能否达到文王、武王的治国功绩，关键在于是否有贤德之人施行善政。魏晋时期政论家傅玄所作的《傅子》一书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圣明的君主必须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天下太平，然而并非凭借良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实现大治，还必须要有贤良的辅弼之人贯彻落实。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才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大变量，如果在国家治理中任用贤能，即使法令制度不完备也能因为尽人事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如果不能选贤任能，制度再完备也很难达到好的治理成果。因此，御马有良方，治国有常道，国家的治乱安危关键在用人。

为何要任人唯贤德，而不是任人唯才能、任人唯资历呢？《资治通鉴》开篇记录了“三家分晋”的历史，“三家分晋”是以“智氏”家族的覆灭为开端的。《资治通鉴》记载，智氏家族的首领智宣子，决定选智瑶为接班人。族人认为智瑶虽有五个优点：“美鬓

任人唯贤：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

□ 罗嘉羽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从本期开始，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中华文明智慧，文史参阅版开设“中华文明智慧”专栏。

长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慧，强毅果敢”，但却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不仁”，缺乏仁德之心，刻薄寡恩，损人利己。而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能施行仁政，反而恃才傲物欺凌别人，迟早会招致祸患。然而智宣子仍然让智瑶当了接班人。智瑶继位后被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了。以史为鉴，司马光展开了一段论述，他认为：智瑶之亡，在于才胜德。贤与能、才与德，是两回事，但世人往往无法辨别，通谓之贤，这就是他们经常失人的原因。司马光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乃德之资，德乃才之师。德是德行，是根基，能培植一切，因

此是统摄性的，好比是掌舵者，才能依赖德行而产生，只是德的辅助而已。在此基础上，司马光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全是圣人，才德兼亡是愚人，德胜才者是君子，才胜德者是小人。并指出，凡是举用人才，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这是因为，比起毫无建树的无知愚人，有才干的小人将会给国家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贤能之人对于治国理政是如此重要，但纵观历朝历代，贤能之人壮志难酬、不被重用导致国家覆灭的案例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生活中没有循名责实，没有真正落实“任人唯贤”。魏晋时期政论家袁准认为：“人虽有子产之贤，而无子皮之举，有解狐之德，而无祁奚之直，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意思是，一个人虽然有子产一般的贤能，但缺乏子皮的引荐，有解狐一般的德行，却没有像祁奚那样举人不避仇的推荐，又如何能够通达而获得重用呢？袁准又指出，就算有祁奚的公正举荐，却没有赵宣子听信忠言，就算有子皮的贤德，却没有他执掌朝堂的权力，即使是荆山的璞玉，也会被当作瓦砾。所以，纵然有管仲的贤能，有鲍叔牙的知遇之恩，也必须遇到齐桓公之后才能显达；有陈平的智慧，有魏无知的引荐，也必须要遇到汉高祖之后才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齐桓公、汉高祖，二人即使有贤能，又

为：“人虽有子产之贤，而无子皮之举，有解狐之德，而无祁奚之直，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意思是，一个人虽然有子产一般的贤能，但缺乏子皮的引荐，有解狐一般的德行，却没有像祁奚那样举人不避仇的推荐，又如何能够通达而获得重用呢？袁准又指出，就算有祁奚的公正举荐，却没有赵宣子听信忠言，就算有子皮的贤德，却没有他执掌朝堂的权力，即使是荆山的璞玉，也会被当作瓦砾。所以，纵然有管仲的贤能，有鲍叔牙的知遇之恩，也必须遇到齐桓公之后才能显达；有陈平的智慧，有魏无知的引荐，也必须要遇到汉高祖之后才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齐桓公、汉高祖，二人即使有贤能，又

如何得到重用呢？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贤能之人发挥作用的四个条件：

- 一是贤能要为人所知，在位者要能够明辨忠奸、崇德辨惑，尊重、识别贤能；
- 二是贤能要为人推举，在位者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求取、举荐贤能；
- 三是贤能要为人所用，在位者要设官分职、委任责成，采纳谏言，用人不疑；
- 四是贤能要为人所安，对贤能要有相应的考核、保障等管理机制，善始善终。

这四个条件，也就是任人唯贤需要解决的四个核心问题，向我们揭示了选贤任能的主要内容。同时，这四个问题的提出，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历朝历代并不缺乏圣贤，经由贤能促成天下大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贤能的价值，是否能以德为本、循名责实，选贤任能。

正如汉代贾谊在其所撰的政论文集《新书》中指出：“渚泽有枯水，而国无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人。”无数历史更迭告诉我们，能否安定邦国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任人唯贤、得贤而用。孔子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想要从根本上实现人安国治、得民心而得天下，务必要选拔贤能之人，通过“贤者在位，能者有职”，使得朝廷崇礼，百僚敬让，这样上位者躬行道德仁义，尊崇尚德的政教方略就会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推行开来，百姓就能知道效法的准则，迁善日进而不自知；国家就会凝聚善缘和力量，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

中华文明智慧



《三事忠告》中的为政智慧

□ 朱保锋

别成书于张养浩担任堂邑县尹、监察御史和参议中书省事期间。最初三部书单独行世，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时任广西按察司金事黄士宏将其合为一册，总题为《为政忠告》，后改为《三事忠告》。就内容看，三者各有侧重。《牧民忠告》主要从德行、操守、职事等方面阐述地方官员应具备的品质及处理政事的能力，《风宪忠告》则主要从自律、尽责、为公等方面阐述监察官员应具备的修养及奉行的工作原则，而《庙堂忠告》主要从修身、立德、尽忠等方面阐述朝廷大员应具备的境界及担负的重要职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将《三事忠告》收录在“官箴”目下，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该书“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于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诚如《四库全书》之评价，《三事忠告》蕴含着宝贵的政德理念。

为政者首重道德修养

张养浩一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始终秉持孔孟之道从仕做人。在《三事忠告》中，他从儒家“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将注重道德修养视作为官从政者的立身之本。在《牧民忠告》中，张养浩开卷即写“省己”与“克性之偏”，强调担任地方官的人人应该时常反省自己，并注意克服性格中的缺点。对于所要反省之事，他首先奉劝为官者得到提拔任命之时，即应扪心自省，反思自己的功劳和能力是否配得上这样的晋升，既往为官期间是否真正做到了矜严自守、勤于政务。在强调“省己”的同时，张养浩还认为每个人“材质强劣，有所不同”，各有其优缺点，为官者必须正视自身不足，并痛下功夫予以改正，“弛缓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庄，率略克之以详，烦苛克之以大体”，只有这样才能为取得事业成功奠定基础。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把“自律”放在首篇，指出“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意在强调从政者要有比一般士人更高的自律意识，而有进言职责的监察官对自身的要求更应严于普通官吏。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也把“修身”作为开篇，强调“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意在提醒官员要清醒认识到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同时，他在书中还分别列举了“善自修者”和“不善自修者”的四种表现，指出“善自修者”做到“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就能“令名随焉，舆论归焉”。

为政者务要戒贪养廉

张养浩居官以清正廉明见称于世，即使身处政局混乱、吏治腐败之时，仍能做到清廉自持纤尘不染。在《三事忠告》中，他谆谆告诫为官从政者要戒贪养廉、洁身自爱。

在《牧民忠告》中，张养浩特别强调戒贪止欲的重要性，劝告为官从政者只有做到谨守清廉，才能避免灾祸远离耻辱。如果清廉失守，即使一时未被查处，也会终日惴惴不安，与其在败露之时悔之晚矣，倒不如一开始就严加防范，以谨守清廉换得坦荡心安。在此基础

上，张养浩还指出家人的“喜奢好侈”是为官之人在廉洁奉公方面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官员必须严格约束家人，严禁侵害百姓利益，更不能目无法纪在外招摇生事。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专门列举了当时监察官员容易出现的十种徇私枉法行为：“或巧规子钱，或盗行盐贴，或荒耽曲蘖，或私用亲属，或田猎不时，或宴游无度，或潜托有司之事，或妄兴不急之工，或旷官第而弗居，或纵家人而不检”。在他看来，以上种种行为均是担任监察官的忌讳，都有违廉洁奉公的基本要求，因此也是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深加自省和坚决避免的。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以诸葛亮和元载为正反案例，奉劝身居庙堂之上的高级官员要效法诸葛亮一生清廉奉公，“二十年无尺寸之增于家”，夙夜在公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世百姓所称颂。切不可像唐代元载一样利令智昏，唯利是图，不仅为世人所不齿，也使自己身陷纒绲追悔莫及。

为政者尤需尽责担当

张养浩入仕之初便立下报国为民之志，终其一生始终心系民瘼，竭忠尽职，在他身上展现了古代文人为官的济世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三事忠告》中，他将个人所秉持的尽责担当精神注入其间，结合地方官员、监察官员以及朝廷重臣各自肩负的具体职责，告诫为官从政者一定要做到居官有为恪尽职守。

在《牧民忠告》中，张养浩从“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闲居”十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地方官员日常工作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文中专门强调为官之人领着俸禄就应竭力为国家做事，如若受俸居官而怠工旷事，那么就不愧对自己的良心，更对不住公道和百姓。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认为身居监察官这样的特殊职位，必须“居其官，则思尽其职”，要始终秉持“道之所在，死生以之”的价值追求，“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即使面对危难，也应有临难毋苟免的气魄。只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才能“上不负国，下不负所学”，也才称得上“为死也大，身虽歿而名不没焉”。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专门写了“任怨”一章，强调为官从政者要敢于担当，始终做到履职尽责任劳任怨。他在文中以范仲淹、管仲、诸葛亮为例，告诫为官之人只要做到秉公用权，即使因此使他人遭受刑罚，也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理解，而如果一味趋利避害沽名钓誉，为了博得所谓的好名声，“一疾言厉色不敢加于人”，事事推诿，明哲保身，那么不仅有失职责，更有违人臣事君之道，其结果必将是祸及自身。

历史文化典籍

（上接1版）

能力建设是关键环节：推进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政治安全“三要素”。此外，新技术演进越来越快，带来社会进步、生活便捷的同时，也考验国家安全能力。目前，各国除高度重视太空、深海、极地等战略新疆域的角逐外，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博弈也正在全球展开，决胜的制高点不仅包括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也包括心理域和认知域。基于此，国家安全能力提升更加需要专业的技术、专业的理论、专业的人才。

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实并用好国家安全政策工具箱。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而言，不仅要铸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盾”，也要有塑造良好国家安全态势的“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于2021年6月10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国为了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制定的一部专门的法律，为我国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

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需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高超的本领。发展和安全是有机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领导干部必须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论，坚持系统观念，善于“弹钢琴”，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既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善于运用发展成果来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又要善于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以安全促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需要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规定，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教育部于2018年印发并实施《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意见》。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依凭的优良传统。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专门工作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路径需要长期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人民力量，方能筑牢坚如磐石的社会堤坝，使危害国家安全者无处藏身、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无以遁形。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理论建设是战略支撑：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以国家安全理论现代化为支撑，构建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长期以来，“西方主义”主导了国家安全学研究的话语权，无论是欧洲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始终都彰显了“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倾向。西方学者研究的立足点，仍是对欧洲经验或是美国经验的理论化总结。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安全领域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从“人的安全”“共同体安全”等视角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能够实现“国际共振”。

国家安全学有极强的跨学科属性。2021年1月，我国开始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这是国家安全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获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外交学院等四家单位获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全国国家安全学建设单位。

学科建设只是起点，目标是能够产出影响国际社会的学术成果，打造学术高原上的学术高峰。要加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调研力度，鼓励中国学者深入世界的“前线”“火线”，使之对安全问题有体验、有感受，如此才能增强思想的洞察力以及学术话语的“锐度”。加强对国家安全相关重点领域的跟踪力度，持续发力从而挺进“无人区”。提升塑造力不仅要有危机应对能力，更要有战略研判能力，要孵化出一流的国家安全学术期刊、一流的国家安全学术共同体，真正夯实国家安全中国学派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未来，应进一步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胸怀天下，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纳入国际理念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不断彰显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现代化的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